



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——兼及诚斋与紫阳的关系

(2005-6-29 14:23:39)

作者：郑晓江

杨万里，学者称诚斋先生，生于南宋建炎元年（1127），卒于开禧二年（1206），吉州吉水人（今江西吉安市吉水县）。南宋著名的诗人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。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中进士，入仕凡三十八年，多有政声。他曾上《千虑策》，震惊朝野，以至朱熹力主晚年致仕在家的他还应该出任官职，云：“只有此老尚可极言，以冀主之一悟。……已作书力劝之。”（1）他为人刚正耿直，不畏权贵，拜抗金名将张浚为师，在朝力排众议，要求兴兵抗金，宋光宗叹其“也有性气”（2）；宰相周必大称其“有折角之刚”，朱熹说“杨诚斋廉介清洁，直是少。”（3）他“立朝谔谔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，“无所顾忌”，从“不曾屈膝不皱眉”。他生性诙谐幽默，才气横溢，与陆游、范成大、尤袤并称“中兴四大诗人”。在文学史上，他锐意创新，其诗以“活法”和“透脱”为特色，独创了“诚斋体”。杨万里一生所作诗据称有二万余首，留存于世的也有4200多首，对南宋诗风的转变、中国诗词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。杨万里后得罪权臣，罢官家居，终则忧愤而逝：“吾头颅如许，报国无路，惟有孤愤！”又书十四言别妻子，笔落而逝。”（4）。本文既非讨论杨万里的文学成就，亦非讨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的实践，将集中探讨杨万里的儒学思想，说明有着鲜明独创意识的诚斋先生，在思想史上亦可说是独树一帜，在汉学变而为宋学的历史进程中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一、开显儒学之源泉活水

杨万里是宋儒中自觉承接儒学道统者之一，其云：“二程子之学，以仁为觉，以敬为守，以中为居，以诚为归，以致知为入，以明道不计功为用。而韩子曰：‘轲死，不得其传。其真不得其传耶？真不见其传耶。’”（5）韩愈认为孟子之后，“儒家道统”中绝了，他又不容辞地承接上儒学的道统；诚斋先生以为孟轲之后，二程子承接了儒家的道统。他说：“伏羲尧舜禹汤文武，圣之高曾也；周孔，圣之祖父也；颜子，圣之宗子也；孟子，圣之别子也；二程子，宗子别子之宗子也。”（6）杨万里为何竭力辩明二程承接了儒家的道统呢？因为他曾师从二位老师，一是胡铨，胡铨是胡安国的弟子，胡安国私淑二程，为泰山再传，其学由儿子胡宏所继承，并由弟子张南轩发扬光大，形成了南宋时期的“湖湘理学”。另一位老师是张浚，《宋元学案》既列杨万里于《武夷学案》中之胡安国的门人，又列为《赵张诸儒学案》中之张浚门人，张浚则列为伊川、东坡再传，安定、濂溪、老泉三传。（7）可见，杨万里师从的二位学者，皆出自二程，视二程为接续道统者，无疑是说他自己也承接了儒家的道统。从学理上而言，诚斋之学与二程也是一脉相续的。这样，诚斋先生论证了二程子承续了儒家道统，同时也就说明了自己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正统地位。这并不是简单的争一个什么正统或声名地位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儒者是否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血脉的自觉承担精神，从而把复兴儒学、光大儒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职志。诚斋是如此思考的，也是贯之以自己的一言一行的。

宋初，尤其是庆历前后，学术界出现了疑经思潮，一方面，学者们从汉唐诸儒章句之学的樊篱中解脱出来，以己意释经渐成为新的潮流新的方法；另一方面，学者们突破字词训释的老路，纷纷直契儒家原始典籍以直接寻求内在的义理。二者终于汇集成了儒学的新形态——宋学，亦即理学，或又称道学、新儒学。在草创阶段，学术贡献卓越的有“宋初三先生”的胡瑗、孙复、石介，他们对儒家早期经典《周易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春秋》等特别关注。后者周敦颐作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，为儒家思想寻求哲学本体的支撑；继之者如二程、张载、朱熹、南轩、象山等，则着力开显儒学“理”与“心”、“性与天道”的论域，再至明儒王阳明等的共同努力，不仅使儒学脱胎换骨，成为体系严谨、含摄广博的理论，更成为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，渗透于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民间社会的各个方面。除这些主要为思想家的贡献之外，我们也不能忽视如文学家欧阳修作的《易童子问》，其大胆疑经，惊世骇俗，对儒家学者走出汉唐儒注疏之学的限囿，创造新说开辟了理论新路；还有如政治家王安石作《三经新义》，一心要恢复儒家经典的经世功能，并贯之以政治的实践，突显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特点，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。从世界文化史来看，人类每一次大的文明进步，皆需复返原始文明，从“源头”获得“活水”，如西方的

“文艺复兴”，就是起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发现；而中国宋明理学的发展，亦奠基于对儒家最古老经典进行的重新阐释之上。

在这一时代思潮中，作为诗人的杨万里，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诚斋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天下有无用之学，有有用之学，训诂者，无用之学也，学之伪也。名节者，有用之学也，学之真也。”（8）为超越汉唐儒训诂章句之“伪学”，求得真学问，他先后作《心学论·六经论》，包括《易论》、《礼论》、《乐论》、《书论》、《诗论》、《春秋论》（9），又作《心学论·圣徒论》（10），包括《颜子论》上中下、《曾子论》上中下、《子思论》上中下、《孟子论》上中下、《韩子论》上下，这二十篇文字，被冠之以“心学论”，说明诚斋先生试图抛开一切加诸儒家经典上的传注章句等，直契儒家原始经典和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，以己之“心”明“经”之理，通过深入地开掘，重现儒学深层义理，再展其生命活力，尤其是力图寻找出儒学的真精神以为时代之用，这与其在诗词领域独创“诚斋体”一样，显示出他在思想史上亦有其独特的见解。杨万里还写作有《诚斋易传》、《庸言》、《天问天对解》等著作，也包含有丰富的儒学思想。

首先，诚斋先生作《易论》。他认为，圣人设教要通过语言来表达，但又有些更内在的东西无法用语言说出来，所以，人们决不可囿于经典中之“文”、圣人之“言”，而应该由心透过“文”与“言”去直达圣人之意。他感叹道：“嗟乎，言也者，心之翳也；晓天下者，暗天下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‘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’嗟乎，圣人之忧天下深矣乎，而或者以为圣人之意圣人自不能尽于言，圣人之言圣人自不能尽于书也。”（11）古之圣人的“道”，往往一者不能全部表述出来，二则亦不可能全部书之于册，所以，人们若完全沉溺在几部经典之内，只是玩味言词，不去仔细体会圣人的“象外之意”，言外之思，“则天下将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”。在此，诚斋先生实际上是对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拘泥于经典的词句，死抠文字训释，不仅难以理解经典，还会离圣人之意越来越远。

运用这种方法去研究《周易》，诚斋穷十七年之功，著出了《诚斋易传》二十七卷。他认为，《易》不是占筮打卦之书，“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”，从宇宙本体太极之变，到阴阳五行之变，再至万事万物与社会和人之变，无有穷尽，圣人忧天下人不得其奥，故作《易》以“通变”。因此，人们无论是要穷理尽性、正心诚意，还是要去齐家治国；或者在人生的旅途中察觉穷通显达、居常遭变等等状况，皆应该以通变之《易》道去掌握去解决。诚斋说：“然则学者将欲通变，于何求通？曰：道；于何求道？曰：中；于何求中？曰：正；于何求正？曰：易；于何求易？曰：心。”（12）以“心”之灵直通圣人之意，从而掌握大化流行之机，人事变化社会治乱之法，如此，穷则能通，危可转安，灾难亦可变为幸福。由对《易》理的本体性把握，诚斋先生解《易》贯彻了一条基本的原则，即“引史入易”、“以史证易”。比如，他在解释乾卦九三爻辞时写道：“乾乾者犹曰键键云耳，虽然九三危而无咎，信矣。亦有危而有咎者乎？曰有。尤、后羿、莽、卓在上而骄其下，在下而忧其不为上。骄则有懈心，何德心勤；忧则有觊心，何位之惧？故终必亡而已矣。或曰，不有操、懿乎？曰汉一变而为魏，盖三世希不失矣。魏一变而为晋，盖再世希不失矣。使魏晋不足征，则乾乾夕惕之戒，妄矣。”（13）这是以历史王朝更迭的史事来说明卦象爻辞。《周易》之卦象爻辞是一定的，而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的活动却是常变的，以定文之卦辞爻辞释史，又以史来证《易》，正是《易》之神而化之的表现；而杨万里用历史的眼光诠释《易》，试图寻求某种发展的规律以为当世之用，即所谓“以史为鉴”，显示出他在解《易》上的卓识和经世致用的释经方法。

诚斋释《易》又是贴近民生日用的，视抽象神秘莫测的“易之道”，实为表现在百姓日常生活之“理”而已。他说：“所以阴阳者道也，道不自立，以器而立，器不自行，以道而行。故孔子曰：何莫由斯道也；孟子曰：夫道若大路然；董子曰：道者，所由适于治之路，仁义礼乐皆其具也；韩子曰：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”（14）“易”之“道”并非远离人间，虚无飘渺，不可捉摸，它就是人们所行之“路”，就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遵行的仁义礼乐。诚斋释《易》真正做到了质朴无华，不故弄玄虚，不以象数图书使《易》复杂化、神秘化、术数化。

[第 1 页]

[[第 2 页](#)]

[[第 3 页](#)]

[[第 4 页](#)]

[[第 5 页](#)]

[[关闭窗口](#)]